

·书札整理研究·

新见江藩致汪喜孙手札五通释读

马 学 良

内容摘要:《乾嘉诸老投赠廿九札》收录江藩致汪喜孙札五通。作书人江藩系乾嘉时期重要的学术人物之一,且与受书人汪喜孙有世交,喜孙视江氏为师长。二人书信往复,江氏指导喜孙读书治学,喜孙向江氏请益学问。此五通信札的整理,既揭示了乾嘉时期扬州学人之间的问答往来,也折射了清代汉学与宋学的冲突。书札内容可补《江藩集》之缺。

关键词:江藩 汪喜孙 信札

江藩(1761-1830),初名帆,字雨来,或作豫来;后改名藩,字子屏,一作国屏,晚字节甫,号郑堂,又自署江水松、竹西词客、辟支迦罗居士、炳烛老人等。本籍安徽旌德之江村(今属旌德县白地镇),后迁扬州府甘泉(今江苏扬州)。江氏师从惠栋弟子余萧克与江声,专治汉学,著有《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周易述补》、《尔雅小笺》、《隶经文》、《国朝经师经义目录》等。

汪喜孙(1786-1848),江藩友人汪中子,因避其九世祖汪太孙讳,更名作喜荀,字孟慈,号且住庵,又号荀叔,江都人(今江苏扬州)。嘉庆十二年(1807)举人,累官至河南怀庆府知府。喜孙幼承家学,擅文学、博掌故,著有《国朝名臣言行录》、《经师言行录》、《尚友记》、《从政录》、《孤儿编》、《大戴礼记补注》、《且住庵文稿》、《且住庵诗稿》等。

200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漆永祥先生整理的《江藩集》^①一书,该书收录江氏所著《隶经文》四卷、《续隶经文》一卷、《炳烛室杂文》一卷、《半毡斋题跋》二卷、《乙丙集》二卷、《伴月楼诗抄》三卷、《扁舟载酒词》一卷及“江氏逸诗遗文三十余篇……有关江藩之传记资料、序跋、评论、师友往还信札与酬唱诗文等”,于江氏著作、资料之搜罗,可谓空前。近日,笔者于河北大学图

^①漆永祥整理:《江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书馆所藏《乾嘉诸老投赠廿九札》中发现江藩致汪喜孙手札五通^①,其中有四通不见是编收录,第五通虽有收录,但较原信札亦有较大删略。今录于下,以飨学林。

《罗鄂州集》一本,曲子一本,希检入。足下所作《许浦都统司砖考》,乞录付一纸。并侯即安,不一。孟慈世讲足下。江藩顿首。(其下钤“江藩启事”白文方印)

另:此札右下方钤有“喜孙秘玩”、“红术轩”白文方印各一。

按:《罗鄂州集》,南宋罗愿所作。罗愿,字端良,号存斋,乾道进士,博学好古,受到朱熹称赞。因知鄂州,有政绩,故称罗鄂州。撰有《尔雅翼》、《鄂州小集》、《新安志》等。

曲子一本,无考。乾嘉时期,扬州学者多博涉众学,其中不少学者在治经史之外,染指曲学,且卓有建树。江藩及与其交好的焦循、凌廷堪等诸家,均深通曲学。江藩与喜孙之父容甫先生汪中为挚友,对喜孙关爱有加,喜孙亦视江氏为师。故此《罗鄂州集》并曲子一本,应为江氏引导喜孙读书所赠。

《许浦都统司砖考》不见《汪喜孙著作集》收录,著作年代、内容无考。据《汪荀叔自撰年谱》云:“嘉庆六年(1801),十六岁。始识江先生郑堂,知赏识金石书画、铜瓷雕漆、刻丝器用及琢砚造墨之法,后以《许浦都统司砖考》质之先生,先生赏之,为延誉于四方文学之士。”^②喜孙之子汪保和等所作《皇清诰授中宪大夫例晋通奉大夫钦加道衔河南怀庆府知府加三级纪录四次显考孟慈府君行述》中称汪喜孙“年十六,究心金石书画,就正江郑堂先生藩,以《许浦都统司砖考》质之,先生亟加称赏。”^③另,清末民国学者闵尔昌所撰《江子屏先生年谱》亦载:“嘉庆六年……汪孟慈以《许浦都统司砖考》见赏于先生。孟慈时方十六岁。”^④据此,此札当作于江氏与喜孙初识之际——嘉庆六年(1801)。

汪喜孙高祖汪镐京(1634-1702),字快士,曾“居歙之古唐村”^⑤,故号西

①《乾嘉诸老投赠廿九札》原件藏于河北大学图书馆,为书信手稿粘贴而成,书衣绢面,清黄子湘题签。书高32.8公分,宽19.20公分,登录号为333172。《乾嘉诸老投赠廿九札》收录了刘台拱、汪端先、孙星衍、江藩、赵魏、赵怀玉、吴鼐、唐仲冕、郑师愈等九位清代乾嘉年间江苏著名文人学者写给汪喜孙的廿九通手札,故名。另,此札最后另有道、咸间黄子湘、张源达、吴云、振藩、孔继鑣、吴瀛等人跋语数通。

②汪喜孙:《汪荀叔自撰年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室辑:《乾嘉名儒年谱》第14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193页。

③杨晋龙:《汪喜孙著作集》,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史哲研究所,2003年,第1269页。

④闵尔昌:《江子屏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室辑:《乾嘉名儒年谱》第10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532页。

⑤汪喜孙:《汪氏学行迹》卷一《快士先生墓表》。

谷,一号红术轩主人。著有《文字原》二十五卷、《紫泥法》一卷、《红术轩印范》一卷、《红术轩山水篆册》四卷。该信札右侧所钤“红术轩”应为喜孙藏印之一。

二

拙著《汉学师承记》望付来手。非石《急就篇考》可掷下一读。籍候即安,不既。江藩顿首。

按:《汉学师承记》,即《国朝汉学师承记》。据漆永祥^①、王应宪^②等人考证,《汉学师承记》约完稿于嘉庆十六年(1811)。今传世《汉学师承记》后有汪喜孙《跋》一篇,文曰“吾乡江先生,博览群籍,通知作者之意,闻见日广,义据斯严,汇论经生授受之旨,辑为《汉学师承记》一书……喜孙奉手受教,服膺有年,被命跋尾,不获固辞,谨以所闻,质诸坐右,未识先生以为知言不也?”^③可知此跋乃江氏完成书稿后命喜孙所撰,时为嘉庆十七年(1812)五月七日。《江子屏先生年谱》亦云:“十七年壬申,汪孟慈为作《国朝汉学师承记跋》。”^④据此,此札或即江藩《汉学师承记》稿成待梓之际,以书稿示孟慈,命孟慈作跋,催孟慈交还书稿时所作,时间约在嘉庆十六年(1811)至十七年(1812)五月间。

《急就篇》乃西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编写的一部儿童识字课本,是一部完整保存至今的产生年代最早的童蒙之书,该书分章叙述各种名物,故又称作《急就章》。汪中“晚而得子,虑为俗学所囿,乃自次其藏书数万卷界之”^⑤。汪喜孙《礼堂授经图自序》云:“喜孙年六岁,先君写定皇象本《急就篇》、《管子·弟子职》教授于礼堂。”^⑥

非石,即钮树玉(1760-1827),字蓝田,号非石(或作“匪石”),人称非石先生,江苏吴县人。非石笃志好学,隐於贾,不事科举之业,精研文字、声韵、训诂之学,著有《说文解字校录》十五卷、《说文新附考》六卷《续考》一卷、《说文解字校录》三十卷、《急就篇考证》一卷等^⑦。此札所言《急就篇考》应即为《急就篇考证》^⑧。钮氏《〈急就篇考证〉自序》云:“曩读王伯厚《补注〈急就篇〉》所引皇象碑本,远出颜本上,求之多年而不可得。嘉庆辛未(十六年,

①漆永祥:《江藩与〈汉学师承记〉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4页。

②王应宪:《〈国朝汉学师承记〉研究——兼论江藩学术思想》,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硕士论文,2004年,第7-8页。

③《汪喜孙著作集》,第66-68页。

④《江子屏先生年谱》,第537页。

⑤刘逢禄《礼堂授经图记》,《汪氏学行记》卷五,1925年中国书店江都汪氏丛书本。

⑥汪喜孙:《礼堂授经图自序》。《汪喜孙著作集》,第703页。

⑦赵尔巽《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第4258页。

⑧《清史稿》卷一四五《艺文志》作“《急就章考证》”。第4257页。

1811)薄游广陵,见汪氏家藏赵文敏手书小楷《急就章》。余为之审定,出皇象本。亟假录一通,藏诸行篋。后又获前明正统间吉水杨君摹宋温仲合刻石本,以之参校,无不吻合,盖其本出休明也……兹以赵本为主,下附异同,曰《校订皇象本〈急就章〉》,好古者或有取焉。”^①广陵汪氏即汪喜孙。可见,钮氏作《急就篇考证》曾参校汪氏家藏赵文敏手抄本《急就篇》,书成后,应曾赠喜孙。

江藩、钮树玉与喜孙互有交往,江藩对钮氏学问极为推崇,谓其“无书不读,亦深小学”,“诗文清峭拔俗,亦当代之畸士焉”^②。此札“望付来手”后所云,盖江藩知喜孙处有钮树玉《急就篇考证》,借派人索取《汉学师承记》手稿之机顺便借观。

三

来帖乃明时接头接尾之伪本也。然皆用旧翻《潭》、《绛》合成之,藩幼时曾见一部,迩年来绝少矣。江藩顿首覆

按:此札当是喜孙就所得字帖之版本向江藩请教,江藩复函之作。汪中、汪喜孙父子均为清代著名藏书家。汪中好友刘抬拱曾评价其“藏书多善本,朱墨烂然,横列座右,杂以金石彝器之属,凡数十年未尝去手”。^③江藩亦云“(汪中)好金石碑版”^④。喜孙承父业,亦喜收藏碑版法帖,并名其藏书之处曰“周玉齐金汉石之馆”。

江藩所见字帖,是明代《潭》、《绛》翻刻本。《潭》、《绛》,指《潭帖》和《绛帖》,二者均为古代著名法帖。北宋庆历年间刘沆帅潭州(今湖南长沙)时,命僧人希白摹刻,以《淳化阁贴》为底本,增入王羲之《霜寒帖》以及王濛、颜真卿等贴,因刻于潭州,故名《潭帖》,又称长沙帖;《绛帖》为北宋潘师旦摹刻,因刻于绛州,故名《绛帖》。

四

前接手书,因有极不如意之事,久羁裁答。伏惟起居迪吉,体候胜常为慰。承问三事:《华林偏略》^⑤,徐勉撰。祖孝徵以《华林偏略》质樗蒲钱文,即此书也。《修文御览》即祖珽撰,《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载此二书。《太平御览》盛行于世,二书遂亡矣。春秋诸臣仕于周者,止晋悼

①钮树玉:《急就章考证》,清光绪吴县潘氏功顺堂丛书本。

②江藩著,钟哲整理:《国朝汉学师承记》,中华书局,1983年,第62页。

③方濬师,《蕉轩随录》卷七《汪容甫先生传》。

④《国朝汉学师承记》,第113页。

⑤按:即《华林遍略》。据胡道静先生考证:《南史》、《艺文类聚》中此书书名作“偏略”,但《隋志》、《新唐志》、《日本见在书目》、《北齐书》、《三国典略》均作“遍略”,二者属通假。但《唐书·经籍志》等写作“编略”则属讹误。详见:胡道静著:《中国古代的类书》,中华书局,2005年,第59页。

一人,断非知悼子,疑是晋悼公。晋悼在周,见于《左传》,而《史记·晋世家》最详,然仕周不仕周,无明文可证,俟更考之。《宋书·地理志》“南阳太守,领县二:考城、鄆城。”至《南齐》“济阳郡,领县一,考城。建武三年,省鄆城,度属南濮阳郡。”“度”者,移之之谓也。《元史》一本呈上,希检阅。草此奉复,兼请日安,不一。孟慈大兄足下。江藩白。(其下钤“江藩启事”白文方印一枚)

按:此札乃江藩答汪喜孙所请教的三个问题之覆函。

江藩一生坎坷,中年连遭母、妹两丧^①,继之屡举不第^②,晚年幕阮元府,《国朝汉学师承记》刊印后又遭人抨击,此札云“有极不如意之事”,不知何所指。

喜孙所问第一个问题,当是对《华林遍略》、《修文御览》、《太平御览》三者关系之疑问。《华林遍略》是梁武帝萧衍命人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此书唐时仍在,但宋初已不传,故修纂《太平御览》时未利用此书。

《修文御览》,即《修文殿御览》,为北齐后主高纬时官修的一部类书。祖珽、阳休之等奉后主敕撰。是书成书于北齐武平三年(572),共三百六十卷,分为五十五部,二百四十类,初名《玄洲苑御览》,后改名《圣寿堂御览》^③,最后改定今名^④。祖珽(生卒不祥),字孝徵,范阳道(今属河北涞水)人,官至尚书左仆射。《北齐书·祖珽》谓其“天性聪明,事无难学,凡诸伎艺,莫不措怀。文章之外,又善音律,解四夷语及阴阳、战候、医药之术,尤是所长。”^⑤但此人品德极坏,曾两次盗卖《华林遍略》,^⑥故江藩云“祖孝徵以《华林遍略》质樗蒲钱文”。据胡道静先生考证:《修文殿御览》是曹魏和南北朝时期编纂的几部大类书中传世时日最为长久的一种,在南宋时,还全部存在,除了江藩所言“《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载此二书”之外,《中兴馆阁书目》、《遂初堂书目》及《直斋书录解題》均有著录。

但因“《修文殿御览》以《华林遍略》为蓝本,大采而特用”,“《太平御

①嘉庆六年(1801),江藩生母徐孺人卒,汪喜孙与江藩初识於此年,前文已述;嘉庆九年(1804)江藩胞妹江珠卒。参见漆永祥先生《江藩与〈汉学师承记研究〉》附录一《江藩年谱新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②江藩乾隆六十年(1795)自京师至金陵应布政使司试,未中;嘉庆三年(1798)自京师至江宁应布政使司试,不中;六年(1801)又至江宁应试,仍不中;十三年(1808),江藩应江宁布政使司试,仍不售;十八年(1813)至江宁再应乡试,仍不中。

③《隋书·经籍志》著录为《圣寿堂御览》。

④李百药:《北齐书》,中华书局,1972年,第105页。

⑤《北齐书》,第516页。

⑥胡道静:《中国古代的类书》,第62-74页。

览》又《修文殿御览》为蓝本”^①。故江氏言“《太平御览》盛行于世，二书遂亡矣”。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知悼子是否曾经仕周。知悼子，晋国之卿，名荀盈、知盈。晋悼公，春秋晋襄公曾孙，名周，修旧功，施德惠，晋国复霸位，谥号悼。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南朝时期济阳郡领属范围问题。因字面浅易，兹不赘述。

五

前月接到手书，得悉北堂安吉暨足下平善，遥企五云，曷胜欣慰。尊公《述学》雕本甚精，与宋槧无异。即此一事，足徵足下之孝思无穷矣！

拙著二种呈上，希削政。中多错字，缘《通志》事冗，未暇校正耳。藩平日从不敢以学问傲人，不知何故，见罪于近日自许之通人名士，大肆诋诃，颇悔灾梨。足下读毕之后，希勿轻以示人，为我藏拙可也。草此，并候，不一。上孟慈大兄先生足下。世愚弟江藩拜手。（图见封二）

按：《汪氏学行记》卷四收有《江郑堂先生与喜孙书》一通，全文仅二十七字：“尊公《述学》雕本甚精，与宋槧无异。即此一事，足徵足下之孝思无穷矣！”盖汪喜孙遵江氏“勿轻以示人”之嘱，编次时对原信函涉及江氏著作的内容做了删节处理。

汪中为乾嘉时期名儒，在世时著作多未及刊行，汪喜孙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搜集、整理、校勘、刊布其父著作，《述学》即为其一。《述学》分内外篇，计有《内篇》三卷，《外篇》一卷，《补遗》一卷，《别录》一卷，附《春秋述义》一卷。是书前有王念孙作序，后有王引之所撰行状。据《汪荀叔自撰年谱》记载，汪喜孙一生至少两度刊刻《述学》，第一次是在其父去世三年后的嘉庆二年（1797），刻《述学》大字本。书刻成后，喜孙不但自己不断校勘，并先后就正于段玉裁、王念孙、顾广圻等人，于其父遗作精益求精，可见一斑。嘉庆二十一年（1816），汪喜孙官内阁中书舍人，“迎养老母京师，舟次宿迁，不戒于火……《述学》旧板、余所著旧稿……一时俱烬”^②。嘉庆二十三年（1818），汪喜孙又重新刊刻《述学》一书。漆永祥《江藩年谱新编》以为江藩所见《述学》即嘉庆二十三年刻本^③。

①清末发现于敦煌藏经洞并被伯希和盗往法国的唐人抄本类书残卷（伯氏劫经编号：P. 2526）所存，其体例颇似《太平御览》，罗振玉将其定名为《修文殿御览残卷》。后经洪业论证，其有可能是更早的《华林遍略》。但是不管敦煌残卷到底为哪一种，其中所存内容、款式皆与《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同。故赵含坤得出《修文殿御览》为《太平御览》之底本的结论。详见：《中国古代的类书》，第62-74页。赵含坤编著：《中国类书》，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8-19页。

②《汪荀叔自撰年谱》，第211页。

③《江藩与〈汉学师承记〉研究》，第480页。

此札所言“《通志》事冗”指江藩受聘于阮元府中纂修《广州通志》一事。嘉庆二十三年(1818),两广总督阮元奏报朝廷新修《广州通志》,江藩屡试不第,南下投奔阮氏。嘉庆二十四年(1819)正月二十三日,阮元得到嘉庆帝披覆,准其纂修《广州通志》,江藩任总纂之一。

乾嘉时期,汉学大盛,江藩作为汉学阵营的主力之一,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到达广州后得到阮元支持,刊行了所著《国朝汉学师承记》八卷附《经师经义目录》一卷,并将此二书寄赠好友。信中所言“拙著二种”应即为刚刚刊行的《汉学师承记》与《经师经义目录》。此事引起同在阮元幕府纂修《广州通志》且向以理学卫道士自居的方东树的极度愤慨,方氏曾与江藩发生过争论,甚至污蔑汉学诸人为“蚊虫”,并上书阮元,希望其主持公道,抑制汉学。此即所谓“近日自许之通人名士,大肆诋诃”也。至于“不敢以学问傲人”、“颇悔灾梨”则属江藩言不由衷之语。江藩乃简傲不羁之士,方东树即称其与江藩辩,每酒酣耳热,江氏狂言“吾文无他过人,只是不带一毫八家气息”^①,于是更加激起方氏怒怨,日后乃作《汉学商兑》,攻驳汉学诸人^②。

从中不难看出,作此札时《广州通志》已经开始编纂工作,而《通志》成于道光二年(1822)三月二十八日,故此札应作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至道光二年(1822)之间。

附记:此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北京大学漆永祥教授指导,特此致谢。

【作者简介】马学良,男,国家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古典文献学、版本学。

①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下,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46页。

②参见漆永祥:《方东树〈汉学商兑〉新论》,《文史哲》2013年第2期,第127-137页。

